

語言學論文選譯

苏联大学“语言学史”课程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 务 印 書 館

語言學論文選譯
苏联大學“語言學史”
課程的討論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 务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輯收录的十篇文章，是苏联《語言學問題》杂志在1954年第4期到1955年第5期这一期間所进行的大学語文系“語言学史”課程的討論。这些討論指出了苏联的这一課程的新方向，阐明了这一課程的內容实质。这个討論的文章可以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語言专业系科的参考。

語言學論文選譯

苏联大学“語言学史”課程的討論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 务 印 书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总 經 售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9017·230

1960年5月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0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数 76,000

印张 3 2/16
印数 1—5,000

定价(6) 0.33元

目 录

关于大学语文系的《语言学史》

| | | |
|------------------------|-------------------------------------|----|
| 課程討論的按語..... | 《語言學問題》雜誌編輯部 | 1 |
| 論大學語文系的《語言學史》課程..... | V. N. Yarceeva | 5 |
| 論大學的《語言學史》課程..... | A. V. Desnickaya | 22 |
| 論《語言學史》課程的內容和設置問題..... | A. M. Finkel | 43 |
| 對設置《語言學史》課程問題的意見..... | I. I. Zukerman | 50 |
| 外國語師範學院的《語言學史》課程..... | T. A. Degtereva N. A. Sliusareva | 53 |
| 對《語言學史》課程的一些意見..... | E. A. Makayev | 61 |
| 對講授《語言學史》課程問題的意見..... | G. S. Ahvlediani | 66 |
| 論《語言學史》課程..... | M. M. Guhman | 72 |
| 談談《語言學史》課程的參考資料..... | M. Ya. Nemirovskiy | 88 |

关于大学語文系的 《語言学史》課程討論的按語

《語言学問題》杂志編輯部

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学一直認為，对各种社会現象作历史的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

語言科学在远古时期就已經产生，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道路。为了要了解这門科学的現状，就必须知道关于語言本质的各种不同觀点的形成和斗争的历史。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在語言科学史上是本質上的新阶段，它从过去語言学所积累的材料中吸取了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成分，并且以新的方式利用过去語言学傳統的成就。斯大林曾严厉地指責了所謂語言“新學說”的代表們对这門科学的历史所抱的輕視态度。

每个語言学家都應該通曉語言学說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大学語文系語言专业的教学計劃中有語言学史這門課程。但是在确定這門課程的目的和任务、确定它在大学其他課程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應該在該課程中闡明哪些主要問題等方面，語言学专家們還沒有取得应有的明确的和統一的意見。在本刊广泛展开有关《語言学史》課程的任务的討論，将有助于改善這門課程的設置。

在确定這門課程的具体任务时，應該考慮到這門課程的一般目的。

應該向学生介紹語言科学的发展过程，从它的产生直到現在的状况。介紹时，主要應該注意从馬克思主义立場上来給过去和

現在的語言學理論以批判的評價。

必須弄清楚各種不同的語言學學派的歷史繼承性；要闡明這些語言學派的觀點對當時的語言研究的貢獻；要說明在有關語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觀點的鬥爭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研究成果，因為這些成果有助於進一步理解語言的各个方面，並且能夠成為創造研究方法的科學根據。在揭露語言學中唯心主義和庸俗唯物主義理論的錯誤哲學基礎時，應該說明語言科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如何以大量的事實和對這些事實的概括逐漸豐富起來，語言學的知識範圍是怎樣在各个方面擴展和深化了的。

如果能把《語言學史》這門課程安排得很好，那末就不單是授予學生這門科學的歷史知識，而且還能培養學生能夠批判地分析各種語言學理論、培養他們研究別人觀點的技能以及理解這些觀點的方法論的基礎。

然而，並非所有的語言學家都認為有單獨開設這門課程的必要，有些人認為關於語言學史的知識應當包括在《語言學引論》、《普通語言學》、某種亲属語言的《歷史比較語法学》等課程里，譬如，應該在講解某个語言問題的時候，適當而簡單地敘述對這一問題的各種觀點的歷史情況。

當然，在設置《語言學史》課程時，必須考慮到這門課程和學生所學的其他課程之間的關係，就是說，應該確定《語言學史》課程在這些課程中所占的地位。

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方面的課程能使學生在研究語言學材料時具有正確的方法，因此，在講述《語言學史》課程時應該依賴於這些課程。

《語言學引論》、《普通語言學》、《語言學史》和選修的《歷史比較語法学》等課程應該構成普通語言學知識的統一的、完整的體系。尋求實現這個原則的正確途徑，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可以認為《語言学引論》這門課程的任務和內容已經相當明確，可以說在這門課程里過多地敘述語言科学发展史是公認不合适的話，那末，在分析《普通語言學》課程的中心問題時，就完全會有被講述這些問題的历史所代替的危險，雖然，在《普通語言學》課程里適當地（如在評述有關語言問題的各種現代觀點的時候）包括一些語言學史方面的材料無疑還是必需的。

《語言学史》在教學計劃中所占的地位（何時哪一年級應該講授這門課程）是由語言學各門課程的相互關係而定的。

所爭論的是關於課程性質的問題：是按年代順序來分析各个語言學學派所建立起來的一般理論，還是選出主要的語言學問題，按歷史順序來批判地講述有關這些問題的不同觀點和闡明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對這些問題的提法和解決；同時，講述和批判個別語言學家的觀點應占什麼地位也是不清楚的。

《語言学史》課程的性質問題直接牽涉着這門課程的內容、範圍、應當解決的問題、這門課程的大綱和必須包含的知識分量等問題。

現有的語言學史講義不夠全面，其中主要包括歐洲和部分古印度的語言學的歷史。

由於討論《語言学史》課程的內容，就產生了這門課程應該按學生的專業而有所區別的問題。在這些有差別的課程里，除了講述語言科學的一般發展情況外，還應特別注意有關該種語言的專門著作。但在進行這種專業化的時候應當仔細考慮，不要使普通語言學史被個別的語文學史所代替。

應該把精確而有根據地劃分語言科學的時代看做這門課程的基礎。而語言學史的年代劃分問題還研究得很不夠，不管怎樣，它們總還沒有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在仔細和全面地研究了自古以來的各種語言學觀點的發展情況以後，才能獲得解決。

高等学校的每一門課程都應該有教學大綱和教材。然而,《語言学史》課程還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而且也遠非所有的大學和每年都開這門課程。制定這門課程的教學大綱是件重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事情。此外,還要大力準備出版這門課程所必需的教材和參考書:如過去語言學家的著作、批評文章、教科書、選集等。

討論有關研究語言學史的問題和在高等語文學校里開設語言學史課程的問題是蘇聯語言學和語言學高等教育的迫切的、重要的任務之一。

篇名: От редакции (к обсуждению курса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znания» н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факультета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原載: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znания》, 1954, 4.

譯者: 馬涓尚

校者: 劉耀武、王德春

論大學語文系的《語言學史》課程

V. N. Yarceva

《語言學史》課程在各大學語文系培养青年語言學专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語言学家來說也好，对每个专家來說也好，都必須熟悉他所从事的那个知識領域的发展史。因为熟悉語言學史能帮助他利用过去語言科学所积累的材料，并使他有可能来批判地評价在語言科学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出現的对同一个語言事實所作的不同解釋。

例如，对历史詞匯學問題感兴趣的語言学家可以見到西歐語言学家們所写的許多著作，这些著作中叙述了个别的詞或个别詞匯层的历史。語言学家在所謂“物和詞”(Sachen und Wörter)学派拥护者的著作里可看見列举了随着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的变化而出現的詞，然而就找不到結構上的和詞义上的分析，这种分析能解釋那些由該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作用所决定的改变詞匯的事实。在站在青年語法学派立場的研究家們所写的书籍和論文里，都把“詞的生命”(即詞的历史变化)說成是消失詞匯和补充詞匯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联想和統覺(apperception)的心理学的規律所預先决定的^①。Trier 的追随者們都从語义方面的理論觀点来看詞匯的类推現象。因此，由于語言学家的一般理論的立場不同，对同一些詞匯事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为了要理解这些解釋的道理，

① 見 K. Nyrop: 《詞的生命》(Das Leben der Wörter, Leipzig, 1923) 和 A. Darmesteter 《从詞义來研究詞的生命》(La vie des mots étudiée dans Leurs Significations, 5éd., Paris, 1899)。

就必須知道詞匯學的历史。

研究語言學史能幫助學生分析他所研究的語言的历史事實，还能帮助他正确地評價他們所用的教材所根据的那种方法論的基礎。这一点对專門研究西歐語言的人特別重要。要知道至今还没有失去价值的西歐諸語言的历史語法和历史語音方面的大部分綜合性著作和許多个别的研究，都是青年語法学家写的。例如 Sweet, K. Luick, Horn, Wright, Bradley, Brunner 及其他許多在英語史方面的著作。这些有丰富事實知識的著作对每个从事英語方面工作的专家來說都是有用的，但只有理解了下面这一点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材料。这一点是：这些著作的作者們的方法論的立場不但决定着對他們研究的英語結構的事实和英語史所作的解釋，而且也决定着他們对所研究的事实进行選擇的本身。

为了要正确地建立高等教育的体系，必需一方面明确规定开设每一門課程的目的和內容，另一方面要考慮到各門課程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說，明确每門課程在与它相近的其他課程的範圍中所占的地位。《語言學史》課程和其他課程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接近《語言學史》的課程可以分为三組：社会政治課程、理論語言學課程和与学生的专业有关的課程。

在分析《語言學史》課程和第三組課程的相互关系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這門課程的專門化問題。如果說語言學觀點的发展史的知識应当帮助专家批判地評價和正确地应用他的专业方面的材料，那末把《語言學史》課程最大限度地專門化，換言之，即单独分别为俄罗斯語学家、为东方語学家、为罗曼-日耳曼語学家开设這門課程岂不是更好嗎？要知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証最大程度地吸取某种个别的語文学史中的材料，而且还可以保証运用为学生所能理解的語言实例。不把這門課程变成个别的語文学史，也完全可能講解，同一些語言學的思想是怎样反映在

每一个国家里以及这种反映的特点怎样用該国的具体历史环境来解释。

我們可以下面这点來說明这个情况，即指出在英國、法國和俄國，在認為語法是全部服从邏輯的一般理性語法的拥护者們和考慮活用語言事實的經驗語法的拥护者們之間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并可指出語言學觀點史的知識是怎样帮助正确理解和評价該語言史的事实的。講課者可根据不同的学生而采用这个或那个实例。

大家都知道，英國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出現了許多記載当时語言規範的英語語法书。其中有几本曾企图确立英語发展的規律性。这些著作對我們來說是有价值的，这首先是因为它闡明了十七至十八世紀語言的特点，同时也闡明了，現代的人是把怎样的語言現象理解为已固定了的和广泛应用的，以及怎样的語言現象在上述的語法书中是被評为“不正确”的，即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語言体系中消失了的。消失的原因或者因为它們是古語体，或者因为它們虽存在于标准語言中，但沒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而沒有法定下来。

但可看出，在这个时期的語法书里对英語中同一些事实的評价是不一致的。如 N. Webster (*A 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art II, Hartford, 1784) 主張用 *you was* [你过去是]的形式，而 R. Lowth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mmar*, London, 1762) 和 J. Priestley (*The rudiments of English grammar*, London, 1761) 只允許用 *you were* [你过去是] 的形式。Lowth 認为在 *I don't like him doing that* [我不喜欢他做那件事情] 这一类型的短語里的代詞用宾格是正确的，而 Webster 却主張在这种結構里的代詞只允許用属格 (*I don't like his doing that*)。Lowth 反对当时的英語在某种程度上还应用双重否定，他的根据是：“两个否定就等于把否定相互抵消而变

成肯定”^①，以及諸如此類。

語言學觀點史的知識使我們有可能去理解英國十七至十八世紀時對英語結構問題產生分歧的基礎，去正確評價這些分歧的方法論根源。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出現的許多英語語法學家可以根據時代的哲學觀點而分為兩派。如果說笛卡兒和斯賓諾莎的哲學理性主義是斷定只有理智才可能是真正知識的源泉，并確定了建立一般語法和完全符合邏輯原則的語法公式的思想，那末洛克的經驗主義則認為感性經驗是認識的基礎，在語言學中這種經驗主義就表現為竭力重視語言的直接應用，因為依據站在經驗主義立場的語法學家們的看法，理智在活語言的自然現象前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的英國，一方面是寫語法書和論文的作者（如 Evelyn, Swift, Addison, Prior 等等）要求在邏輯規則的基礎上，并組織適當的被公認為可以監督語言純洁性的研究所來把語言規範化，另一方面，在經驗主義學派的擁護者們（如 Howell, Oldmikson, Brightland, Greenwood 和其他人）的言論里却竭力強調語言“實踐”和“習慣”（usage, custom）的重要性。

上述兩種觀點的代表們的鬥爭也反映在對利用拉丁語法的公式來說明英語結構的可能性的評價上。經驗主義者們堅持每一種語言的自然特點，所以否認拉丁語的型式能對建立活語言的語法有影響。如 William Loughton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English tongue*, London, 1734) 就反對把拉丁語法的規則應用到英語里來，并批評那些“企圖把我們的語言服从（與我們語言的本質相違反的）拉丁語法的方法和規則”。但是一般語法觀念的擁護者們却認為害怕把拉丁語的規則應用到其他語言中去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理性主義的語言學家們企圖建立一種適合全人類邏輯範疇的

^① 大家都知道在現代英語里，句中只能有一個否定成分。

和对任何一种語言來說都同样有用的語法公式。他們还常常力图証明正是在拉丁語的材料中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式，如 John Wilkins 的一般哲学語法(*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London, 1668) 就是。他們純粹按理性来理解拉丁語，然后把利用拉丁語的材料拟制的公式机械地应用到英語中来。于是把邏輯和語法看成是同一个东西。如上面我們所看到的，Lowth 反对在英語句子里用双重否定，他的根据就是：用双重否定和邏輯是相抵触的。

当然，并不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所有的英語語法都是上述两种“純粹的”語言学学派的例証。在英國十八世紀出現的許多語法著作(在十八世紀出版，距今超过一百五十年)中，我們可以看到上述两种理論的一定的折衷觀點。由于这种折衷的理論——在解釋語言材料的原則方面和在評價英語語法的事实方面的不彻底性：“實踐”的活流和从拉丁語法汲取过来的傳統規律錯杂在一起了。但对英語专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决定某作者的立場的一般語言学的观念，是要理解他所闡述的某个語言事实，但如果沒有通曉語言科学史的知識，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語言学史和学生所学語言的历史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專門課程是緊密地联系着的。

在法国語言学史中也可举出类似上面所举的引自英國語言学史中的事實。法國民族語言的形成和发展引起当时一系列的迫切問題。在法国十六世紀时，古典派(Pleiades)七詩人(Ronsard, Du bellay 和其他人等) 奋起維护在一切文艺体裁中应用法語，并极力为向拉丁語斗争、丰富法語詞匯的形式、建立民族語言的語法提出理論上的根据。由于这个緣故，产生了語言的“正确性”問題，这种正确性被某些学者理解为語法对“理智”的适应。

十六世紀的其他一些理論家奉行經驗主义的原則，他們認為

在分析語法事實和詞匯事實時、在評價修辭標準時，必須考慮到的只是語言的活用^①。

語言的合理性，“正確性”和“習慣”、“應用”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顯得特別尖銳，成為十七世紀語言學著作中的中心問題。十七世紀在 Port Royal 修道院里編著出來的著名的法語語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Paris, 1660）即體現了理性主義和一般性的原則。這種語法對其他國家建立類似的語法有影響。哲理語法在本質上是反歷史的，它不考慮個別語言及其發展的特點；因此漸漸地消失了自己的地位，而給它最后一擊的是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重要的是要強調指出，法語語法方面的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之間的鬥爭是由社會實踐本身、標準語言規範化的任務以及標準語言的發展和豐富所引起的。

從俄國科學史中也可利用類似上述的材料，這就是關於別林斯基活動的材料。別林斯基維護研究祖國語言的語法而摒棄那種煩瑣哲學和教條主義，它們是一般語法的擁護者們，如 N. I. Grech，在俄國培植起來的。雖然別林斯基是根據邏輯的原則建立語法的，但它在這種語法中廣泛地闡明了俄語的民族特點。還應該評價一下 A. H. Vostokov 的活動。他在《俄語語法》(1831)一書中嘗試包括所有不同體裁中的俄語現象。他的句法觀念和 Grech 的觀念是相對立的。

所以，我們看到，語言學史中的同一個題材可以適應個別的語文學史而加以講解。

這樣分門別類地講授知識的益處是很明顯的：這種方法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教學大綱，同時，可以保證講授該語言史的教

^① 見 P. Ramus (Pierre de la Ramée) 的《法語語法》(Gramme, Paris, 1562) 和 L. Meigret 的《法語語法論》(Le tretté de la grammére françoese, Paris, 1550)；和他著的《為法語正字法的辯護》(Défenses touchant le livre de l'orthographe françoese, Paris, 1550)，他們都企圖把“理智”和“習慣”協調起來。

师能从讲《语言学史》的教师那儿获得具体的帮助。

但是按上述的体系来建立《语言学史》课程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把数量不多的学生分成过小的班级是不合适的。第二，能开这样“专门化”课程的教师又太少。还有比教学过程的组织问题和培养合格教师问题更为主要的是另一种困难：并不是语言学思想史的所有问题都和我们上面所讲的问题一样与专业的语文学这样直接接近的。例如，根据 A. Schleicher 的说法，是先有无形态语言，然后演变成粘着语，再演变成屈折语，那怎能为俄语专业的学生把这种关于语言中不同形态类型的历史顺序的争论与俄语的材料联系起来呢？当然可以说，俄语在结构上是屈折语，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形态结构的语言，而各个语言学家对这种或那种形态类型的优越性的评价是不同的。但这样远离题目的“解释”是否能使人信服呢？主要的，这样的解释是否需要呢？

因此，并不是语言科学史的所有问题都能与个别语文学的材料直接有机地联系起来。由于这样，我们觉得为大学语文学系各班学生开设《语言学史》的普通课程是比较合适的。这门普通课程应该占用 36 个学时。在学生听完了这门课以后，最好再组织一系列关于语言学史的个别问题的特别课程（每门课占用 32 个学时）。这些课程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专业，选出那些对于研究该语言的学生来说是最关切的问题和便于与该个别语文系的材料联系起来探讨的问题。如果学时不够，那当然只好单开一门《语言学史》的普通课程。

在开设《语言学史》课程时，必须要考虑到它和各社会政治学科，特别是哲学史的有机联系。

当然，要是学生在马列主义哲学、逻辑学以及社会史方面有很好的知识，那他就有巩固的基础来掌握语言科学的一切部门。而讲《语言学史》课程的教师也必须经常涉及到各社会政治学科。如

不知道哲学史，就不可能分析关于語言的本质、語言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語言历史演变的途徑問題的各种觀點，总之，即不可能分析語言学史中各著名学派的代表者解决得不同的一切問題。解决普通語言学中象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关系这样重要的問題，不单要有語法特点的知識，还要有邏輯規律的知識为前提。而在語言科学史中关于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解决，不但是依据研究語言的語法結構現象的情况，而且还依据某个时期在邏輯学、心理学、哲学領域里占統治地位的那些觀點。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的斗争是怎样反映在不同的語言学理論的斗争中的。

从上面举的英国十七至十八世紀語法思想史的例子中，我們已經看到，理性主义哲学是怎样决定一般語法的建立的，又是怎样确立邏輯規律和語法規律的同一性的觀念的。这样的例子是不难举出的。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們的原理决定了 de Brosse 的語言机械論，而 W. Humboldt 关于在語言的不同形式中获得实现的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觀念是和康德主义的哲学紧密联在一起的。

分析某一种語言学理論的哲学根源对批判現代語言科学中的唯心主义流派具有特殊的意义。如在現代美国語言学中得到大肆宣傳的是研究“純粹語言事實”的方法，这种理論是 L. Bloomfield 及其門徒^①根据語言是无穷的刺激和反应这个定义而建立的。而这种定义是建筑在实用主义哲学立場的基础上的。語言学中的“物理主义”(Физикализм) 的代表者这样来理解語言的本质，就在他們所采用的語言学分析的方法上和他們选择所研究的問題上烙

^① 見 O. S. Ahmanova 的《論美国结构主义者的語言学研究方法》(《語言學問題》1952 年第五期，第 92—105 頁) 和 M. M. Guzman 的《反对現代美国語言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反动势力》(布龙 L. Bloomfield 和“描写”語言学) (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莫斯科出版，1952 年第四期第 281—294 頁) 两篇論文中对 Bloomfield 學派的理論所作的批評。

上了痕迹。Bloomfield 認为語言是个人受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而这反应又去刺激听者产生下一个反应，所以他把語言只分成两种現象——語音和連續不断的刺激与反应。Bloomfield 認为語言基本上是一种生理現象；因而不能算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这种理論的結果就使他在一方面企图把任何的信号（受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看成和語言是等价的东西（所以对“物理主义者”說来，人类的語言，犬之吠声，火光信号和火車的汽笛完全是同样的現象），另一方面又只对語言的結構方面（从断代性的觀点来看）发生兴趣。所以 Bloomfield 的美国門徒們的著作只局限于音位学的問題和描写某种語言的形态构成，决不是偶然的。語言史的問題，尤其是联系人民历史的語言史問題完全从“物理主义者”的視野中被排除了。

因此，对語言本质本身的錯誤理解引起了美国結構主义者的其他一切錯誤觀念，并决定了分析語言事实的方法。而語言本质的定义，如我們所看到的，是直接从美国結構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得来的。所以，《語言學史》課程不但必須講解某一語言学派的代表者所創立的不同的語言学理論，还必須闡明这些理論的哲学根源。因而，在講解《語言學史》課程的过程中，必須要与《哲学史》課程相配合。

《語言學史》課程和《普通語言學》課程是很接近的，而后者应当变成普通語言學教育的整个体系。常常有这样的意見，說《普通語言學》課程从所研究問題的結構來說，应当是《語言學引論》課程在扩充的重复。但这种意見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語言學引論》这門課程不单是《普通語言學》的入門課程，而且是一切其他普通的和專門的語言學学科的入門課程，它的任务是傳授基本的語言學事實和概念的牢固知識。

在《語言學引論》課程中，闡述一切問題都应当是极其扼要的，